



中梵關係 1980-1997

蘇主榮著

李子忠譯

梵蒂岡與中國政府關係正常化一事，是中國天主教會和普世華人天主教會最關心的事情之一。大部份人士都感到中國教會分裂得太長久了。這分裂愈持續下去，裂痕就會愈發加深和難以癒合。許多人問究竟羅馬和中國方面有否竭盡全力去解決這問題，促使中國教會內部修和，並與梵蒂岡和普世教會再度合一。當然，香港的天主教徒很關注這情況的進展，尤其在我們考慮到自己的未來，而要面對一個將備受中國影響的新特區政府時。我們身為中國教會一份子，如果國內天主教徒之間的分裂能夠癒合，可以設想香港教會的情況必然會因而得到裨益。

誰能定斷所做的一切是否足夠，或者應做得更好呢？實在是眾說紛紛，有些指控甚至認為梵蒂岡向來偏袒稱為地下教會的一方，皆因它多年來效忠教宗和切願成爲普世教會一份子。但我們必須知道，由於羅馬和普世教

會爲了使中國政府認可的教會重新與他們共融而向他們有所表示，令到一些先前極力忠貞於羅馬的教友對國外的這些友善姿態產生反感，聲言如果政府認可的教會獲羅馬承認的話，他們便會作出一百八十度的逆轉。這事顯出國內天主教徒間的分裂和誤解是何等強烈。

我們在聽到有關主教和祝聖禮「合法問題」此等常用措詞時務須留意，因爲它具有一個相對的含義。對羅馬和非政府認可的教會一方而言，「合法」即指與羅馬共融者；但對中國政府而言，則是指那些與政府認可的教會組織合作者。因此，對一方是合法的事，對另一方便是不合法的，反過來也是一樣。由於政府堅持要藉自己的機制來控制教會，於是便產生了這個棘手的難題。

我相信可以公道地說，雖然在梵蒂岡與中國政府間曾進行了不少私下的磋商，但大多數改善關係的建議都首先是來自梵蒂岡一方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一年在馬尼拉時作了這方面的建議，

但中國並未能作出善意的回應。相反，中國方面所作的聲明全是針對羅馬在當今教宗下所作的主動表示。而這些反應更是千篇一律的：「中國教會事務是一項內政，絕不容任何外來干預。」

我們要承認，過往數位教宗對中國的正式聲明都是基於他們對全球共產政權的一貫態度，而這些強硬的聲明，大大激怒了中國的新領導人，因爲這些聲明譴責他們的激烈改革和無神主義原則。這些教宗對詳盡的消息並不知情，而他們所知者不外是天主教愛國會的成立、在未知會羅馬前便自選主教、以及人們受到信仰迫害等消息，這些驅使他們公然發出強烈的譴責。這正是庇護十二世在數個通諭中譴責中國政府和愛國會分化和迫害天主教徒時的語調。他在一九五二年的《勗勉中國版難教胞》公函、一九五四年的《致中國人民》公函和一九五八年的《宗徒之長》通諭中，對修好並未留有多少希望。中國政府自然對梵蒂岡作出同樣強烈的批評。這些宗座的公函及通諭罕有地採用了挑釁性的言語。例

如庇護十二世提到「欺詐和狡猾的試圖」；他又說：「邪惡已趨沒落，禍害已近盡頭。」他說愛國會的主教「並沒有行使職能的權力。他們雖然可能具備有效的教會神品，卻不合法地、犯罪地和褻瀆地行事。就聖經的比喻來說，他們無異於竊賊和強盜。」這些措詞肯定不會在中國政府或官方教會領導階層當中贏得很多朋友。

教宗若望廿三世曾說中國教會是裂教，直到一大群曾在中國傳教的主教們和當時的羅馬華僑勸他勿用此類字眼，並向他保證真正的情況並非如此時為止。可是，他說由於自己不能改掉「裂教」這口頭禪，竟不為意地在他後期的通諭中最少再用了兩次。他繼續批評愛國會的領導人，因為他們聽從人的命令而非天主的命令，並在信友當中引起恐慌，立下惡表。他提到迫害，但他說得沒有像庇護十二世那樣凌厲。若望廿三世最後換上一個切願對話的態度。他於一九六一年發表的《中國及天主教會》，至少從梵蒂岡的觀點而言，確是中梵關係的第一個

明顯轉捩點。他說：「嚴酷苛刻的話已成過去，從今以後只有諒解和祈禱。」可是中國方面並未欣賞這轉變，沒有作出改善關係的相應行動。

教宗保祿六世較若望廿三世更進一步，他有更多機會清楚看到中國實況，他能接觸到更多曾在中國工作的傳教士和海外華人，他更放棄譴責，並因為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而贏得許多中國國內的朋友。他在獲選為教宗後在《致中國領導人書》中說：「歸屬教會絲毫不減少中國天主教徒的愛國心，反而使之加強，並使天主教徒以負責的精神為國家的安全、和平和進步作出貢獻。教會不是來統治，而是要來服務。」他承認必須譴責無神主義制度，尤其是共產政權，但他亦設法理解選擇此等制度的領導者背後的動機，發現他們的動機往往是值得讚許的。他在一九六五年發表的《在現代地窟中的天主教徒》中說，他有意繼續若望廿三世的政策，避免使用嚴酷的譴責，這並非因為迫害者不值得這樣的譴責，只為避免與他們抗衡而使他們變本加厲。他想使天

主教徒免受進一步的痛苦。可惜所期待的善意回應並沒有來臨，因而亦無法改善彼此的關係。

教廷由庇護十二世至保祿六世期間，逐漸減少使用譴責口吻而多用修好的言詞，但中國方面仍沒有對這些有意改善關係的主動表示作出友善的回應。若望保祿二世有見於此，便明確表明對共產制度統治人民的方式全無好感。他當選教宗前曾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的波蘭生活多年，亦曾多次與政府交鋒，竭盡己力去影響和促進波蘭和東歐的人權與宗教自由發展，畢竟他沒有用過先前教宗的凌厲詞鋒。他隨即開始強調對中國應放棄責備而採取溫和的政策。他察覺到採取責備只會使已經惡劣的情況更形惡化。因此，他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首次有關中國的公開聲明《為偉大的中國人民祈禱》中表示，他切願恢復與中國的直接接觸，而且他常為中國祈禱，並察覺到中國的領導人對宗教有新的尊重，他更對此滿懷希望。他期望會有進一步的發展，繼而帶來中國內的全面宗教自由。他強調只是與中國的外在

接觸中斷了，但他卻在內心和祈禱中懷抱所有中國人民。

雖然面對這樣有意修好的言詞，中國方面仍繼續堅持說中國教會事務與教宗無關。人民可以仰慕他、為他祈禱、並與他保持精神的聯繫，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關係可言。他們會繼續自選主教，並自行決定有關教會的事務，教宗無權過問。有趣的是中國天主教徒可以為教宗和他們的領導人祈禱，但如果教宗提議其他人士與他一起為偉大的中國人民及他們的領導人祈禱時，便會被視為干涉內政。難道只有教宗需要他人的代禱，而中國則不需要嗎？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教宗邀請全球主教為中國教會祈禱書》公佈後，所得到的回應也是如此。當然只有死硬派的無神主義者，才會在別人為他們祈禱時感到不快的！然而國內及全球天主教徒都視這書函為相當積極的善意表示。他這盛讚「偉大中華民族」的善言善語，被眾人視為有利於邀請中國政府作出相類似的積極與修好回應的創意行動，可惜教

宗的話再一次被曲解爲一種不必要的干預。結果未有產生任何建設性的成果。緊張的關係也沒有任何突破。

可是教宗並未有半點畏縮。他鍥而不捨地尋找機會去恢復對話。可惜中國當局的反應始終如一。他們總是把他的主動表示曲解成有意在中國內鞏固勢力和實行不受歡迎的干預。若我們細閱若望保祿二世一切有關中國的聲明，便會發現他對所有中國人懷有深厚的情懷和愛心，並誠心切願幫助教會的成員同時成爲優秀的國家公民和優秀的天主教徒。大部分人都會承認這是任何一位教宗所能採取的值得讚許的做法，可是這並未獲得中國政府的接納。他對中國教會的真正情況的認識愈來愈深，影響到他對中國的態度有更敏銳的改進，這些改進可見於他在一九七九年首次公开发表有關中國的聲明，及繼後他於一九八一年在馬尼拉企圖打破僵局而發表的講話，敦促衆人要忘記過去並設法理解中國內的天主教徒，因爲他們要面對政府和愛國會領導人而

被迫作出極端困難的決定，他甚至質疑我們在同樣的壓力下能否作出比他們更好的決定。台灣的主教會四次來羅馬向他述職，他在接見他們並與他們討論，初時還以爲他們正扮演著中國與外界之間的橋樑角色，但他漸漸明白到這是中國教會的內部問題，只能靠直接有關人士才能獲得解決。他最近曾表示，只有在教會的公開和地下雙方停止彼此指責，並共同歸向基督來尋求解答時，他們才能達致修和。雙方都要問基督想他們做什麼，然後彼此轉向對方求得寬恕和再次合一的保証。假若教會上下一心希望合一，政府也無法阻止這事的發生，而且只有當他們能以合一的教會名義發言時，才可以堅持自己成爲普世教會的一份子的權利。

中國共產政府或許能夠在過往教宗的官式文件中挑剔，指責他們對中國的政策是缺乏對國內事情認識的結果，可是他們很難從若望保祿二世那充滿修好的善言中，找到可以攻擊他的地方，他們便因而轉爲攻擊他的誠意，堅持說他在有關中國的事情

上言行不一致。誠然他曾設法與中國內的教民有某些牧民上的接觸，就如他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所做的一樣。他到世界各地進行牧民訪問時，都歡迎來自中國的神職人員及教友，好能對中國內的真實情況有更好的了解。事後我們不難明白，為何中國官員以教宗單方委任鄧以明主教為廣州總主教是一項不必要的干預，許多人會認為顧慮到當時的緊張關係，這事理應更謹慎處理的。雖然在其他情況下這是極正常的做法，但從中國政府的觀點來看，這是一項挑釁行為。

最近當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性大事上，並想知道究竟這六百萬人的命運如何之際，教宗也和其他人一樣，說要留心察看中國會否信守實踐她的許多承諾，這些都是中國為了說服英國及世界承認她對香港的主權而作的。所有世界領袖和世上每一個關心此事的公民，都有權利期待中國信守她所作的承諾。

結束本文時我們可以問：「究竟是什麼阻滯了

中梵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台灣的問題一向是中國的第一號要求，而羅馬已表示對此採取開放態度。事實上，梵蒂岡與台灣國民政府的外交關係已經大降級。至於中國的第二號要求，即有關選任主教一事，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可以在提名（而非任命）主教上，作出一些協調。可是中國並未軟化她的態度，或作出任何實際的配合，因此愈來愈明顯，中梵關係的任何改善全在於並有待中國教會本身的復合。只有在教會以一致的聲音向政府發言時，他們與教宗和普世教會再次合一的希望，才能夠在事實上而非只在心靈上獲得實現。這肯定能大大有助於中國的天主教徒，亦有利於中國政府，因為享有自由的天主教徒必然對自己的宗教自由感到欣慰，因而更努力服務國家。這也會裨益普世教會。我們愈來愈清楚看到，就如海外的教會人士從未放棄大陸上的兄弟姊妹，同樣，國內的教會人士即使外表上與我們疏遠，也是由於他們信仰生活的環境所使然而已。

□